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的优化与创新路径分析研究

李欣 余元宵 游涛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已经成为高校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和提升育人效果的主要渠道。本文通过对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的背景分析, 以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为研究对象, 来探讨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的机遇与挑战, 并对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的优化与创新路径进行分析研究, 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创新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 提升文化育人效果。

关键词: 人工智能; 高校; 文化教育; 教育教学方法; 创新路径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作为一项新兴的颠覆性技术, 既是科技发展的硕果, 更是推动教育革新的关键动力。人工智能的出现, 将文化教育的育人使命推到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在此背景下, 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正发生着深刻变革。本文将分析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在人工智能视域下的机遇与挑战, 对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的优化与创新路径进行研究。

一、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背景分析

文化, 作为一种对人类行为和思维方式具有深刻影响的力量, 它在塑造学生的全面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伴随社会对高校生综合素质要求的日益提高, 高校文化教育的任务愈发复杂和关键。目前, 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已取得显著成效, 众多高校积极推行以文化育人为核心的教育活动。就教育教学方法而言, 教育教学活动虽采用多种不同方式, 呈现出各异的教育效果, 但在第一、二课堂、教育者以及教辅资料的使用层面仍存在一定问题。第一课堂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呈现出以教师主动讲授、学生被动反应为主要的特征。在此种课堂情境下, 教师过于忠实于教材开展教学活动, 致使学生缺乏自由创造和创新的机会。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 进而限制了其思维发展, 甚至丧失学习的主动性; 第二课堂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尚未摆脱填鸭式教育模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 整个学习过程缺乏系统性, 且具有较强的随机性。长期以来, 第二课堂中学生的参与效率偏低, 其选择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这不利于高校学生实现全方位发展, 难以满足高校学生对文化的多元需求。从教育者角度来看, 部分教育者知识丰富程度不足, 在文化知识领域涉猎范围相对狭窄, 且知识更新速度难以跟上时代最新动态。这一状况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依赖传统讲授方式, 进而导致课程内容单一乏味、缺乏创意与灵活性。同时, 部分教师因缺乏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技巧, 致使教学课程枯燥乏味, 缺乏吸引力,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在文化教育教辅资料的运用环节, 部分教师仅仅单纯依靠教辅资料进行讲解, 未能对其展开深入挖掘与解读。相应地, 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仅仅停留在教辅资料的表面内容层面, 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以及深入探讨。由此可见, 教辅资料仅仅沦为教学中的一种点缀, 对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为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高效地运用人工智能, 以提升高校文化育人成效, 已然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 强人工智能视角: 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中教育群体主体地位弱化

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是指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算法进

行自主认知、决策和行为, 能够像人类一样深度思考, 拥有所有精神力量的机器。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作为一种附加精确算法和严密技术的智能机器, 它具有独立的思维推理逻辑, 能够像人类一样进行独立思考、分析和推理, 其关键点在于拥有自我意识。在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活动中, 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在自我意识之中思考和选择如何进行文化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步, 通过建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联性来适应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群体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对教育者而言, 在教学决策方面, 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快速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在这个过程中, 教育者可能会逐渐依赖人工智能的决策, 从而失去在教学计划制定中的主导权。在知识传授方面, 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可以快速准确地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 提供丰富的知识资源。学生可能会更倾向于向人工智能寻求知识解答, 而不是与教育者进行互动交流。这使得教育者在知识传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看, 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的自我意识可能弱化教育者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对受教育者而言, 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如同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搜索引擎’,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受教育者对知识内容的‘搜索需求’, 受教育者过度依赖 AI 智能问答、AI 机器写作、AI 内容审校等人工智能赋能媒体衍生出来的 AI 助手来满足个人知识需求。强人工智能 (Strong AI) 的自我意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受教育者发挥学习主体性, 使其难以主动从文化知识中深入理解和领会文化教育的内涵, 进而更难以获得主观意义上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强化人工智能 (Strong AI) 在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的应用, 其特有的自我意识会导致教育者失去主导地位、受教育者淡化主体意识, 这是人工智能视域下优化与创新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2. 人工智能伦理视角: 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陷入教育伦理困境

人工智能伦理本质上是关系伦理, 它是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与发展中不得不回应的存在论问题。人工智能应用于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既带来了应用价值, 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风险。人工智能的介入需要人、机的交互, 这一需求容易触发伦理风险。

首先, 教育安全角度: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 ChatGPT、Sora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从初期注重单一场景技术应用的工具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具有整合多领域信息、自主创新能力的“智能体”。这一“智能体”应用于高校文化教育教学中, 它依据 AI 算法整合海量信息, 体现了人工智能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削弱学生的选择能力, 使学生产生认知安全问题。在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方法中, 以学生为教育主体,

注重学生通过意识活动获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体验,信息摄入方式以“人工写入”为主,而人工智能视域下的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通过 ChatGPT 和 Sora 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信息扩散和传播,形成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碎片化的信息化环境,这种环境影响了学生选择信息的能力,对自我认知造成困扰。其次,教育关系角度: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校文化教育领域智能化和个性化的趋势逐渐显著,“人机协同”是其重要体现。但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人机协同”的分配成为新的问题:教育者如何以教师为主体身份进行教学和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种情况:第一,教育者与人工智能难以协同,教育者角色地位认知不清。第二:人工智能完全取代教育者,教育活动缺乏情感思想交流。

最后,教育公平角度: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更迭加剧教育不公问题的产生。对人工智能使用对象不一产生教育不公影响。面对高校使用群体:一是学生群体,因地域差异的影响,学生群体使用人工智能产生使用差距;二是中老年教师群体,因年龄、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中老年教师群体产生排斥情绪,不愿使用人工智能,智能素养欠缺。对人工智能信息处理方式不同产生教育不公影响,教育教学资源层面:一是非人为的信息处理方式,基于人工智能呈现的教育教学资源,留存使用者的搜索“足迹”,不同使用者的搜索内容不同,经过 AI 算法“叠加”“重合”等方式处理,教育教学资源出现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二是人为的信息处理方式,由于利益、权力等因素的驱使,技术人员可能在教育教学资源的呈现路径上做“手脚”,呈现“加工”后的教育教学信息资源,可能会引发教育价值引导误区、教育教学内容偏差等问题。

三、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创新路径分析

1. 耦合教育技术与教育主体,巩固教育群体主体地位

合理审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群体的价值与地位,思考教育群体如何与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深度耦合,巩固教育群体的主体地位,是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方法创新路径探索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主要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方面进行创新路径的分析,并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教育者在高校文化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自我认同层面,教育者需清楚教育主导地位,明白人工智能技术独立存在于教育活动中,人工智能是一个“他者”形象,教育者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人工智能助力高校文化教育教学发展,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教育者要在态度层面肯定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价值。在自我实践方面,教育者需认真学习人工智能知识,提升人工智能素养,在高校文化教育活动中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传授多样化、合理化的文化知识,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引导学生获得情感共鸣和价值体验。第二,受教育者在高校文化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在自我认同层面,受教育者要在教育者引导下,化被动为主动,增强主体意识,发展主体能力,培养主体人格。在自我实践方面,面对 AI 助手提供的多元文化教育资源,教育者需要引导学生进行对比转化、内外整合、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资源进行学习。总的来说,教育群体需提高自我认同意识,巩固教育群体主体地位,降低强人工智能(Strong AI)强大的自我意识带来的影响。

2. 营造安全人工智能环境,规避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的介入,在高校文化教育活动中会产生人、机交互的需要,继而产生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问题。因此提出相应的规避风险策略,以回应前文提到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问题。

首先,教育安全层面,相关技术部门需重视人工智能两个环节,设计开发环节以教育价值主导下的技术规范和科学标准来监

督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实践应用环节以法律主导下的教育制度、政策和法规来指导人工智能在高校文化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高校需重视文化教育的选择与被选择的方向,面对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碎片化的信息,学生要提高信息选择能力,同时学生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多元化的信息环境,要合理筛选并呈现可被选择的文化教育资源。其次,教育关系层面,厘清“人机”关系,正确处理“人机协同”这一棘手问题。在高校文化教育教学中,教师课前做到协同预习与协同备课,根据人工智能的预测和摸底,选择适合学生学情需要的文化教育资源,然后进行预习任务布置和备课;课中做到协同授课和协同测评,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教学阶段学情检测,教师根据学情反馈进行精准教学决策,最后结合人工智能对学生进行综合测评分析。课后做到协同辅导、协同批阅和协同评价,可以凭借人工智能给学生提供自适应辅导。批阅作业类型划分为主观题与客观题,机器直接自动识别评判客观题,主观题则分模块发送给相对应的教师,达到“人机协同”发展教学的效果。最后,教育公平层面,政府部门对于贫困地区学生群体需加强贫困资金资助和支持,设立文化教育专项基金,为贫困学生配备人工智能学习设备和网络资源;国家颁布优惠政策,降低贫困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对于中老年教师群体,提高人工智能素养,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帮助掌握人工智能技术;鼓励中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师进行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学习,共同提高文化教育教学水平。此外,教育教学资源层面,一是优化教育教学资源分配,高校建立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教育资源库,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同时对教育资源进行差异化处理,确保各类学生都能接触到适合自己的教学内容。二是相关技术部门研发更加公平、透明的人工智能推荐算法,避免教育资源同质化,同时加强教育教学资源的监管,对呈现的教育教学信息进行严格把关。

参考文献:

- [1]HOFFMANN C H. A philosophical view on singularity and strong AI[J]. AI&Society, 2022, 38(4): 1-18.
- [2] 刘子玥. 关于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的思考[J]. 电子元件与信息技术, 2021, 5(07): 7-8.
- [3] 吴娟, 罗小龙, 周炳文, 等. 人工智能时代媒体的实践与思考[J]. 南方传媒研究, 2024(03): 29-33.
- [4] 周玄, 赵建超.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与正向规约[J]. 江西社会科学, 2022, 42(10): 37-43.
- [5] 邱颖, 魏本亚. 价值论转向: 学生主体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教育评论, 2019(07): 35-39.
- [6] 何文涛, 张梦丽, 逯行, 等. 人工智能视域下人机协同教学模式构建[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23(02): 78-87.

基金项目: 本项目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Chat GPT 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研究”(编号: 202410720018)和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十四五”规划项目“中外高水平大学法律顾问制度运行机制与模式比较研究”(编号: SGH23Y23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欣, 女, 汉族(2001年11月——), 商洛市镇安人, 陕西理工大学2022级学生,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余元宵, 女, 汉族(2004年11月——), 延安市安塞人, 陕西理工大学2022级学生,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游涛, 男, 汉族(1982年12月——), 陕西西安人, 陕西理工大学教师,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